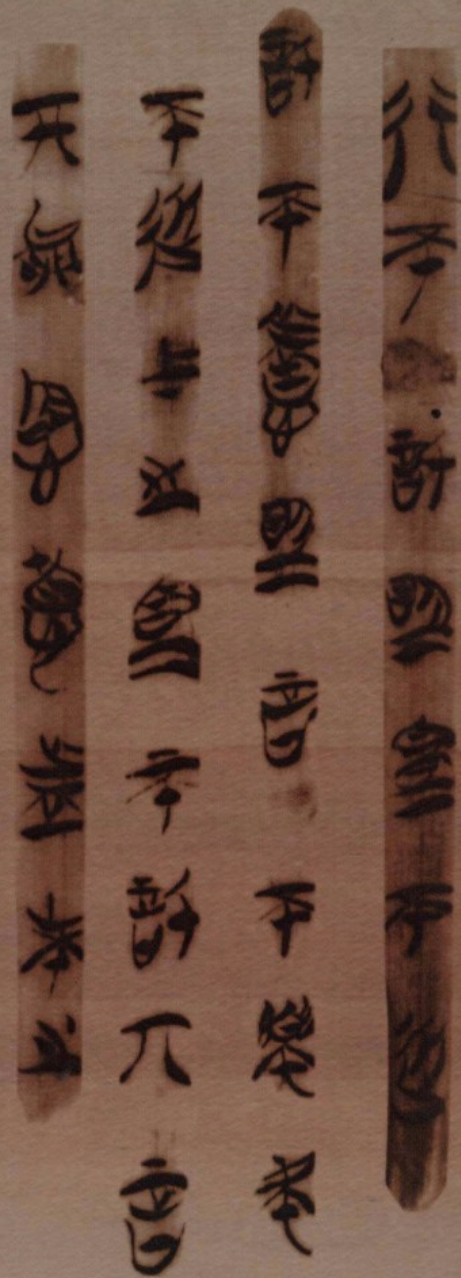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三十二）

丁原植／主編
楊朝明／著



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三十二)

丁原植／主編 楊朝明／著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台灣書房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 楊朝明作. --初版. --
臺北市：台灣古籍， 2007〔民96〕
面：公分. --（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
ISBN 978-986-7332-91-2（精裝）
1. 儒家 - 論文, 講詞等 2. 文獻學 - 論文, 講詞等
121.207 96004688



出土思想文物與文獻研究叢書 8J32

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

作 者 楊朝明
編 輯 蘇情文

發行人 楊榮川
出版者 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408號
地 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339號4樓
電 話 02-27055066
傳 真 02-27066100
郵政劃撥 18813891
網 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tcp@wunan.com.tw

顧 問 得力商務律師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7年4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台幣1500元整

中華書局
PDG

自序

幾年前，我出版了《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齊魯書社，二〇〇二年），《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在性質上與之相同，實際屬於它的續編。

近十幾年來，我從事學術研究，在自覺不自覺中，先後主要集中在了魯國歷史文化、周公與周文化、儒家文獻研究三個領域，現在回味起來，感到從事孔子與原始儒學的研究，這應該是比較合理的幾個切入點。

孔子與早期儒學以魯國的歷史與文化為背景。孔子屬於他的那個時代，更屬於他所在的國度，研究孔子儒學，既要考慮其時代性特徵，又要注意其地域性印痕，只有這樣，對孔子、儒家的研究才會更客觀，更接近真實。以往，人們多從當時的時代性上著眼，從春秋末年的大環境中分析觀察，而對於孔子與魯國的關係用力不足。但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人們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觀念一定反映著該時期的社會實際，那麼，不難理解，研究春秋經濟文化與學術文化的相互關係及其影響，魯國是理想的剖析之地，而剖析作為孔子文化母體的魯國，自然就是研究孔子與儒家思想最為切實的途徑。

周公與周文化研究實際屬於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淵源問題的研究。很顯然，如果孔子處在中國文明形成的初期，那麼，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就一定會打很多的「折扣」，而中國古代文明的實際卻遠非如此。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既有橫的關聯，更有縱的因革，正如孔子所說，三代之禮是「損益」關係，周文化是在夏、商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文、武、周公之政精粹上古三代，周公則「多才多藝」、「大有智」，從而奠基了周代的禮樂文明，惟其如此，孔子才崇尚周政，尊崇周公。顯然，對周公與周文化的研究既屬於中國上古文明研究，更屬於孔子和儒學研究。

儒家文獻研究是我近年研究的重心。我認為，儒家文獻研究是孔子、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核心，就像古史辨派的辨別古史最後都不得不落

腳到辨別古書那樣，文獻是思想的載體，沒有對儒家文獻相關學術問題的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孔子與儒學的科學研究也就無從談起。

或許儒家文獻研究的重要性已經決定了它的難度，儒家文獻研究之難可謂原因多多：其一，學術界對中國上古文明的發展程度認識不夠，評價偏低；其二，儒家認為「六經」乃「先王政典」，是儒學根本，但「六經」性質不同，而相關記載匱乏；其三，孔子「述而不作」，孔子遺說由其弟子後學整理，數量雖多卻顯得凌亂；其四，孔子儒學胸懷天下而關注民生，思維恢宏卻包蘊精微；第五，自宋代開始興起的疑古思潮到「古史辨派」時期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所謂的「辨偽學」出現了極大偏失；第六，近代以來中國國力的落後，人們遷怒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嚴重影響到對孔子儒學的客觀評價。

我認為，孔子儒學研究之所以存在如此之多的難題與紛爭，除了儒學自身體大思精的特徵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儒家文獻研究方面的嚴重失誤。

儒家文獻研究的失誤是長期以來疑古辨偽思潮影響的結果。傳統的「辨偽學」偏頗地審查史料，帶著有色眼鏡檢查審核古書，最終使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成為「受災」最為嚴重的領域，早期儒學典籍幾乎無一倖免。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學者都沒有看到或者遠離了事實的真相，只是這樣的聲音顯得十分微弱，正如近代學者談及《古文尚書》研究時高聲讚揚閻若璩而很少注意毛奇齡等人的結論那樣；就像顧頡剛《孔子研究講義》介紹清代學者《孔子家語》的研究僅僅表彰孫志祖、范家相而仿佛沒有陳士珂那樣。在疑古大潮的推動下，人們的傾向性十分明顯，人們已經難以理性客觀，難以做到「正本清源」。

具體而言，儒家文獻研究出現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懷疑古書的相關記載，不相信古代典籍有關成書時代與作者的記載，人為後置了不少典籍的成書年代；其二，不明古書傳流的一般規律，不能動態觀察古書的形成過程，以今例古，遂造成對古書的很多誤解；其三，缺乏對先秦時期中國學術源流的細緻研究，不能整體把握夏、商、西周到春秋、戰國學術文化的發展演變，從而顛倒了同類文獻的先後順序，甚至誤判了學派屬性；其四，不能理解各個學術派別之間的縱橫關係，不能理解各個學派之間的彼此交融與互相影響，先入為主，用貼標籤式的方式進行學派判斷，無端地將古書問題複雜化。

本書名曰《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從題目看，似乎並不都是由出土文獻入手，而實際上，本書中的幾乎每一項研究，都是出土文獻所帶來的新認識。將本書與我已經出版的《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合觀，讀者不難發現，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儒家六經和孔子遺說研究方面，對新出土的簡帛興趣濃厚，但也涉及到早期文化的不少其他書籍。

對儒家學術的研究需要有廣闊的視野，就儒談儒未必能夠知儒。本書收有與儒家文獻研究密切相關的四篇文章：《東周王陵「六馬之駕」發現的學術史意義》、《關於〈六韜〉成書的文獻學考察》、《從〈武王踐阼〉說到早期兵文化研究》、《〈史記·周本紀〉關於周先王世系的記述》。《六韜》研究直接與《逸周書》、《尚書》研究有關，《武王踐阼》屬於《大戴禮記》，與《周禮》、《逸周書》等聯繫密切。至於選取《史記·周本紀》研究的一文，目的在於觀察疑古思潮背景下，古代文獻研究之失到底有多麼嚴重！本書後面收有五篇讀書劄記，讀者從中或許更能夠了解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

需要交代的是，書中的絕大多數文章都在學術期刊、會議文集等發表過，為保持原貌，本書只是在統一體例方面進行了加工。由於這些文章各自成篇，不同的文章之間或有重複，為保持文章的完整，一般未做大的改動。我深深知道儒家文獻研究之難，因而也就不敢自以為是。書中的缺點錯誤，敬請指教！

目 錄

「六經」之教和孔子遺說——	
略談孔子研究的資料問題	1
《逸周書·寶典》篇與儒家思想	31
《逸周書》所見克商之前的周公	43
《周禮》「六詩」與周代的詩樂教化	63
《左傳》「季札觀樂」與孔子刪詩問題	71
孔子與《易傳》關係申說	83
公羊學派「《春秋》王魯」說平議	93
《詩經·閟宮》「三壽作朋」試解	105
新出竹書與《論語》成書問題再認識	111
《論語》首章與《孔子家語·屈節》篇——	
孔子政治命運悲劇的兩個詮釋	127
從《窮達以時》看孔子的「時遇」思想——	
兼談《論語》「學而時習之」章的理解問題	143
讀《孔子家語》劄記	157

孔門師徒與原始儒家學派的構成	177
子貢在孔門弟子中的特殊地位	209
子夏及其傳經之學考論	225
子思的內修理論與誠信學說	243
《禮運》成篇與學派屬性等問題	255
《中庸》成書問題新探	275
從孔子弟子到孟、荀異途——	
由上博竹書《中弓》思考孔門學術分別	293
上博藏竹書《從政》篇「五德」略議——	
兼說《從政》應該屬於《子思子》佚篇	307
上博竹書《從政》篇與《子思子》	317
上博竹書《魯邦大旱》小議	329
東周王陵「六馬之駕」發現的學術史意義	337
關於《六韜》成書的文獻學考察	345
從《武王踐阼》說到早期兵文化研究	359
《史記·周本紀》關於周先王世系的記述	375
說說那部最著名的「偽書」——	
答劉義峰關於古文《尚書》問	385
關於《周禮》成書的「舉證責任」	391

「轟然打破」的成見——

《孔子家語》偽書案的終結	397
「疑古」大幕籠罩下的《孔子家語》	403
可歎的「『空夫子』時代」——顧頡剛《孔子研究講義按語》讀後	409

「六經」之教和孔子遺說

——略談孔子研究的資料問題

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使孔子研究一直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有人說：「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大概還找不出第二個人，像中國的孔子這樣，在差不多兩千五百多年的日子裏，受到無數億萬人的關注，從尊崇、膜拜，到評論、指責，乃至謾罵、揶揄，竟從未中斷過。」然而，時至今日，由於學術研究出現的偏差，特別是長期以來疑古思潮的深刻影響，在孔子研究資料問題的認識上，除了為數不多的歷史學家外，許多的研究者還存在不少錯誤的認識，不少人論述孔子的思想學說僅僅依靠《論語》一書，認為這是唯一可信的孔子史料，除此之外，似乎任何資料都不可靠；更有甚者，還有學者懷疑《論語》中的個別篇章，認為是其他學派的東西竄入進來。¹這樣，孔子這位歷史文

¹ 還有學者主張對《論語》進行所謂「分解」式的研究，因為《論語》的可靠性有疑問，無論其結集時間、篇目多少、《論語》傳本還是文字真偽，都還存在問題。西方的某些學者對《論語》的懷疑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說，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受疑古思潮的影響，英國的漢學家韋利堅持認為，《論語》一書二十章，只有第三至第九章是可靠的，其餘各篇均係後人所加。這一疑古考證已經成為西方漢學的經典著作至今仍有較大的影響」；「有一對學者夫婦——布魯克斯夫婦（白牧之、白妙子），從事先秦思想史研究。……布魯克斯夫婦更進一步，只相信第四章的前二十節是可靠的，其餘都是孔子的學生們在二百四十年的時間內逐步加上的。這一結論引起了較大的爭議，新聞媒體對這一結論作了各種很有趣的發揮與引申。不過，這一結論的本意是史學的研究，他們試圖尋求真相辨出真的孔子學說來。」（程鋼：《西方學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載黃留珠、魏全瑞主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第一輯，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化名人就失去了依託，好像他只留下了《論語》中的片言隻語。如果是這樣，我們偉大的孔夫子就真像有人所說成了「空夫子」。

毫無疑問，要全面研究孔子的思想，全面研究孔子的學術貢獻，必須正確認識孔子研究的資料問題，這不僅是孔子研究的基礎，是儒學研究的基礎，也是整個所謂「元典」文化研究的基礎。筆者認為，研究孔子，絕不能不考慮孔子與六經的密切關係。孔子曾經認真整理古代文獻，刪《詩》《書》，訂《禮》《樂》，贊《易》，作《春秋》，古籍中的相關記載言之鑿鑿，不容人不信。另一方面，孔子長期從事教育，他有不少珍貴的思想材料被其後學弟子記錄並流傳下來，如保存在《孔子家語》、《孔叢子》中的有關材料就長期遭受懷疑，幾乎被棄置不用，至為可惜！另外，其他相關典籍中也保存著大量的孔子研究資料，只是人們對這些材料的認識並不一致，這也同樣有待認真檢討。本文試結合學術界的最新研究談一點初步認識，希望能引起孔子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一、「六經」及其教化功能

孔子與「六經」的關係，是認真研究孔子所不能迴避的問題。實際上，前人對此論述已多，但不少人在許多相關問題上的認識還十分模糊。

（一）「六藝」與「六經」

「六經」原稱「六藝」。「六藝」之名始見於《周禮》，《周禮·地官司徒·保氏》說：「保氏掌建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但這裏的「六藝」是指禮、樂、射、御、書、數，是古代教育的六種科目。後來，儒家的「六經」也稱「六藝」。

司馬遷在《史記·滑稽列傳》中說：「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

秋》以義。」賈誼《新書·六術》說：「是故內本六法，外體六行，以興《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又如，班固的《漢書·儒林傳序》說：「古之儒者，博學於六藝之文。」顏師古注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唐張守節在《史記·孔子世家正義》中說：「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

從史料記載看，「經六」之名在先秦時已經確立。《莊子·天運篇》記載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一般認為，《天運篇》屬於《莊子》的《外篇》，《莊子》的《內篇》比較可靠，《外篇》和《雜篇》則時間較晚。但新出地下材料改變了人們的這種認識，湖北江陵張家山、安徽阜陽雙古堆兩座漢墓中均發現了《莊子·雜篇》的竹簡，根據研究，已經可以證明《莊子》的《外篇》和《雜篇》成書應該「距離莊子活動的時間不遠」，很可能就在先秦時期。² 莊子以後，「六經」之稱就通行起來，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有「五三六經」一語，《史記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六，六經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

關於「六經」的次序，史載不一，因此引起了後人的注意，唐朝學者陸德明等認為「用《易》居前」本於「『六經』著述早晚」，周予同等人認為「以《詩》為首」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其實，「六經」與孔子有密切關聯，孔子對於「六經」的認識有一個變化過程，使得關於「六經」的次序問題有了不同說法。馬王堆帛書《要》篇提供了孔子與《周易》關係的最新線索，結合傳世文獻，不難看出，孔子到了晚年才對《易經》產生了濃厚興趣，晚年之前並不重視《周易》。可能由於這個原因，原來六經次序常常以《詩》

² 一九八八年初，湖北江陵張家山一三六號墓出土的《莊子·盜跖篇》，下葬的上限為漢文帝前元十三年（前一六七年）（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一九九二年第四期）；一九七七年發掘的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竹簡，其中有幾篇《莊子》殘簡，據考證屬於《莊子·雜篇》的《則陽》、《外物》、《讓王》。該墓主人是西漢的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此人卒於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前一六五年）（韓自強：《阜陽漢簡〈莊子〉》，《文物研究》總第六輯，黃山書社，一九九〇年）。

為首，其順序為《詩》、《書》、《禮》、《樂》、《易》、《春秋》；而到後來才用《易》居前，將《易》冠於《詩》、《書》、《禮》、《樂》的前面。³

（二）「六經」的不同特徵

《詩》、《書》、《禮》、《樂》、《易》、《春秋》都屬於經書的名字，但各經書都有其獨特的性質。孔子整理「六經」，實際是整理古代傳承下來的文化資源，這些文化資源是深厚而多元的。對此，前人的認識已經十分明確，如《莊子·天下篇》說：「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按照《莊子》的說法，「六經」之中包含了治世的一切，無論大經大法，還是細枝末節，「大小精粗」，無所不有，所以《莊子》讚歎「古之人其備乎」。

荀子的說法與之相同。《荀子·勸學》記曰：「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關於「六經」的各自特徵，司馬遷也曾經談到，他的說法與《莊子》十分接近。他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民）。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⁴

³ 廖名春先生專門探討過「六經」的次序問題，對前人的論述進行了細緻分析。見其《「六經」次序探源》，《歷史研究》二〇〇二年第二期。

⁴ 《史記·太史公自序》。

各經之功能不同，戰國秦漢人的認識大致都是如此。例如：

《荀子·儒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新書》卷八《道德》：「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讀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

《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和，其失在權。」

《春秋繁露》卷一《玉杯》：「《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

依我們現在的眼光看，經由孔子整理的「六藝」涉及到了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易》屬於哲學，《書》屬於政治學，《詩》屬於文學，《樂》屬於藝術，《禮》屬於倫理學與行為規範，《春秋》屬於歷史學。有學者從出土文獻

中得到啟示，從而給經書以現代的解釋，認為《詩經》所代表的人是感情的動物，《書經》所代表的人是政治的動物，《禮記》所代表的人是社會的動物，《春秋》所代表的人是歷史的動物，《易經》所代表的人是具有終極關懷的動物。⁵

(三) 「六經」與「王道」教化

「六經」何時稱為「經」？「六經」的次序如何？好像都與孔子有密切關係。《博物志》卷六《文籍考》曰：「聖人製作曰經。」孔子之前，經書已經存在，只不過那時的經書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面貌不同。春秋時期，《詩》、《書》、《禮》、《樂》是人們共同學習的科目，《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有「說《詩》、《書》而敦《禮》、《樂》」就證明了這一點。《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說的也是春秋時期的普遍情形。《詩》、《書》、《禮》、《樂》為「先王」之書，因而受到孔子的重視。

孔子重視「六經」，是因為他看到了「六經」中蘊涵的「先王之道」，認識到了「六經」的教化功能。孔子認為，「六經」各有特徵，對社會大眾也能起到教化作用，他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⁶

⁵ 杜維明：《郭店楚簡與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⁶ 《孔子家語·問玉》，又見於《禮記·經解》。

「六經」有益於社會教化，對於這一點，孔子和後來的儒家都是十分明確的。董仲舒的說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說：「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⁷

孔子嚮往三代之治，不滿於春秋以來的社會現實，看不慣當時「禮崩樂壞」、王道不行的政治局面，於是，孔子才整理「六經」，並以之教授生徒。《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於是，「孔子閔王路廢，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詩》、《書》、《禮》、《樂》之外，《易經》成於殷末周初，《春秋》為魯國國史。孔子對《詩》、《書》、《禮》、《樂》進行加工整理後，又「贊」《易》而作了《易傳》，據魯史而成《春秋》，從而以「六經」作為教材教授弟子。《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整理「六經」根本的原因就是擔心王道廢弛，在他看來，古代典籍中存在著「先王之道」，欲使「王道」彰顯，可以借助先王舊典。因此，他整理「六經」，借助「先王正典」和歷史事實以明王道，用孔子的話說，就是「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⁸。《漢書·地理志》也說：「孔子憫王道將廢」，乃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

二、孔子與「六經」

對於「六經」及其文化功能，孔子都有深刻的體認。因此，他致力於「六經」的整理與研究，使之成為儒家的經典，這也是孔子對於儒學奠基所作的重要貢獻。在孔子看來，「六經」包蘊博大，誠如《韓詩外傳》卷五所云：「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孔子與諸經之間的關係各有不同，在孔子對「六經」所作的加工中就能

⁷ 《春秋繁露》卷一《玉杯》。

⁸ 《史記·太史公自序》。

體現出來。讓我們逐次進行觀察：

（一）孔子與《詩》

孔子以前，《詩》當然已經存在。那時，《詩》與人們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在宮廷、貴族的祭祀、典禮、宴會中，它常常以一種樂舞的形式出現，從而被當作一種儀式或娛樂賓客的節目。在政治、外交和其他社會生活中，《詩》還被用作一種表情達意的交際工具，此即古代所謂「獻詩陳志」和「賦詩言志」，公卿、大夫們將詩句等運用於政治活動諸方面，或借獻詩以表達其頌揚與諷諫，或借賦詩在社交場合表達思想感情。⁹

孔子以前，詩篇眾多，孔子對原有的詩篇進行刪訂整理，並以之作為教本教育學生，形成了今本《詩經》。孔子刪詩之說，現在所知最早出自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道：「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詩》在孔子以前是什麼面貌，孔子為何對《詩》進行整理，又是如何進行整理的，《孔子世家》均有涉及。《論語·子罕》則記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和《漢書·禮樂志》的相關記述，孔子所「正」主要是正其篇章。孔子在「《詩》、《書》缺」的情況下，確定《國風》、《小雅》、《大雅》、《頌》的起始篇章，即《詩經》的所謂「四始」，使先王禮樂教化的遺規稍稍恢復舊觀而可得稱述，此即《孔子世家》所謂「備王道」。

主張孔子曾經刪詩的學者，認為今存《詩經》以外有不少的逸詩，這是孔子刪詩的基本前提。如宋代的歐陽修《詩譜總序》云：「司馬遷調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為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去

⁹ 楊朝明：《魯國與〈詩經〉》，《中國史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二期。